

南汉康陵的陵寝制度

张强禄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南汉康陵是目前所发现的五代十国时期陵园建制最为完备的一处帝王陵寝，本文从陵园制度着眼，对比唐宋皇陵乃至五代十国其它帝陵和贵族墓葬，指出康陵虽然规模不大，却建制完备，个性突出。其整体布局沿袭唐代，但圆形方座陵台改变了汉唐封土以方为贵的传统，封土刷灰粉饰的作法为宋代皇陵所继承，陵前的廊式建筑则为唐宋皇陵所不见。尤其是方座陵台上的覆钵状包砖封土丘，是否与印度佛教建筑中的窣堵波有关？

关键词：五代十国；康陵；刘龔；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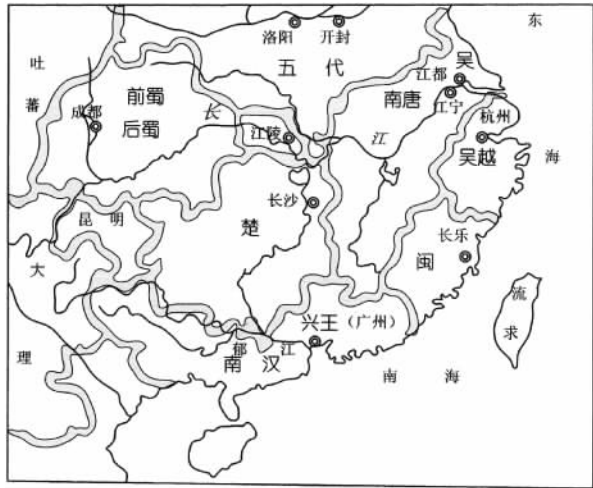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2-0060-05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岭南的一个独立王朝，后梁贞明三年（917 年）十一月一日，刘岩（初名岩，更名陟，复名岩，改名龔，终名龔）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建元乾亨，改广州为兴王府。翌年（918 年）改国号汉，史称南汉。到宋开宝八年（971 年）宋兵入广州，后主刘鋹降宋，南汉亡，前后经历了 55 年的时间，算是五代十国当中存在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王朝（图一）。

康陵即刘岩的陵墓，位于广州市小谷围岛北亭村东南侧的大香山南坡（图二），依山而建，三面环山，一面向水，视野开阔，陵园位置显然是经过精心勘察过的。坐北朝南，范围南北长约 160 米，东西宽约 80 米，面积达 12800 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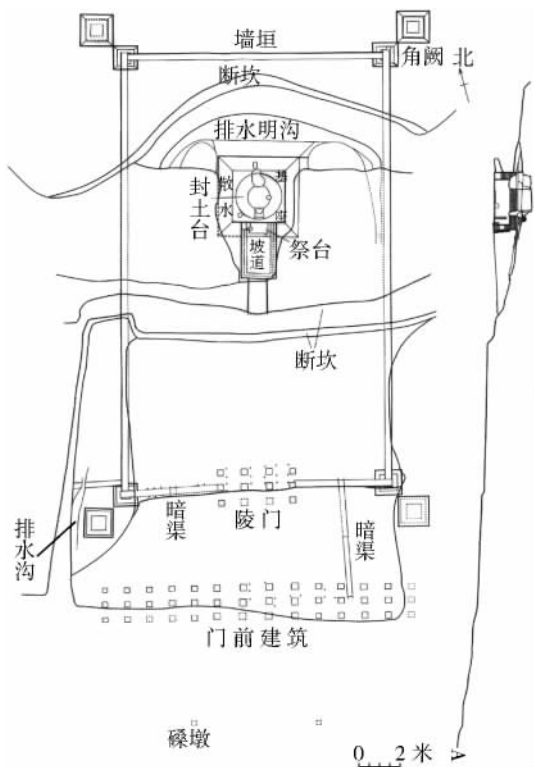
图一 南汉国疆域范围示意图



图二 康陵所在位置示意图

南北高差达 15 米。整个布局主要由陵墓及地上建筑（陵台）、四周的围垣和陵门，以及陵门南面的廊式建筑三大部分组成，陵台北部及两侧、西南角阙外侧均设有排水明沟，陵园南部有跨南垣的砖砌暗渠^[1]（图三）。

康陵不仅是南汉三陵（即德陵、康陵、昭陵）中陵园布局最为完整的一处，而且是目前所发现的五代十国时期陵园建制最为完备的一处帝王陵寝：陵墓位于陵园正中偏北，由地下的地宫和地上的陵台组成，周围环绕有散水和排水沟（图四）；陵墓四周围护有神墙，神墙南部正中建有神门，四隅建有双角阙，南神墙外侧还有一排廊式建筑，其南侧推测可能还有神道或石狮、望柱等。与唐宋皇陵以及唐陵中“号墓为陵”的陪葬墓相比，形制上是大同小异，应该是基本遵从了自汉



图三 康陵陵园遗迹平、剖面图

以来的陵寝制度，但与后者统一大帝国的皇陵相比它的规模则小的多了，建制也简化了许多。

二

“从《长安图志》卷中所载《唐昭陵图》、《唐肃宗建陵图》和《唐高宗乾陵图》，结合考古调查的成果来看，（唐代）陵墓的周围有方形墙垣，墙垣四边的中央设门，东为青龙门，西为白虎门，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墙垣四角建有角阙用作警卫”^[2]。唐代陵墓除“因山为陵”之外，也多沿用汉代陵墓以方形为贵的制度，在平地上起建正方形的陵台（坟丘），呈上小下大覆斗形。北宋陵墓四周和汉唐一样有方形墙垣，称为神墙，神墙四面正中开门，称为神门，神门四角设有角阙。可以看出，方形陵台四周围护有墙垣，墙垣开有神门，四隅设角阙的布局是基本不变的。康陵陵园布局也大体采用这一形式，但规模是小得多了，而且因地制宜又有所增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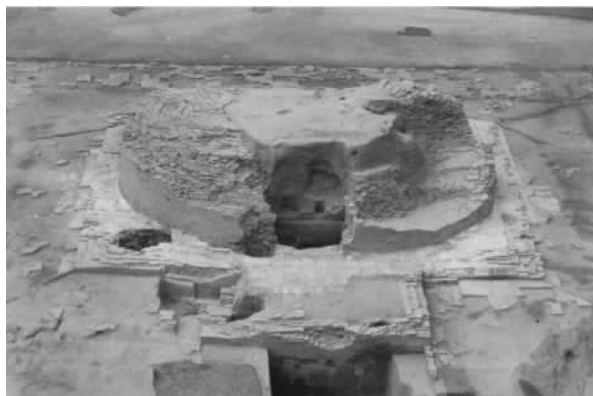
即便同现已发掘几座的“号墓为陵”的唐陵陪葬墓相比，无论是陵台还是陵园规模，康陵都不具可比性。如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封土底边长43米，高18米。陵园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43米；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封土底边长56米，高14米。陵园南北长363米、东西宽220

米；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墓封土底南北边长56.7米，东西边长55米，高约17.9米。陵园南北长256.5米、东西宽214.5米；定陵陪葬墓节愍太子李重俊墓封土边长30~35米，现高约10.2米。陵园南北长170米，东西143米；桥陵陪葬墓惠庄太子李墓，封土底边长32米，顶部边长4米，通高约7.5米。陵园南北长144.5米、东西宽114米^[3]。规模最小的惠庄太子墓都要比康陵大出许多。

北宋陵园规模较唐陵小，杨宽先生认为可能与营建陵园的时间短促有关，“宋代取消营建寿陵的办法，必须等待死后才开始营建，只有七个月的营建期限。因为按照礼制，死后七月必须安葬，才得把神主送进太庙供奉”^[4]。即便如此，北宋皇陵规模仍相当可观：宋宣祖永安陵上宫为方形，陵台略呈方形覆斗状，现存底部东西长27、南北宽22米，顶部边长3米，高6.9米。神墙“周四百六十步”，即每边长115步，约合184米；宋太祖永昌陵陵台也为方形覆斗状，现存底部东西长48、南北宽45米，顶部东西长18、南北宽14米，高14.4米；宋太宗永熙陵陵台现存底部边长51~53、顶部边长10~11、高16.4米。永昌陵和永熙陵上宫宫城平面均呈方形，边长约240米^[5]。而康陵陵垣南北长96.8米，东西宽57.3米，陵台基座边长仅10.2米，残高2.2米，反映出偏安一隅的地方割据政权小王朝的国力和气势了。

与同时期的相同级别的墓葬相比，南汉三陵的地宫和康陵陵台规模也都不大（图五）。五代冯晖墓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墓门、甬道、墓室五部分组成。

南北长44.2米，东西宽16.3米，墓室内顶高7.14米。封土残留部分为不规则覆斗形，底径南北7、东西6.5米，残高5.7米^[6]；五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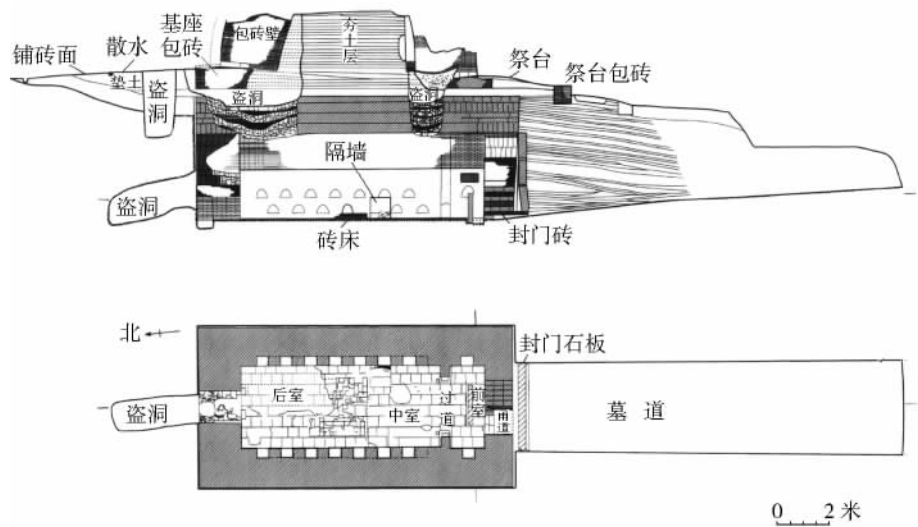
图四 南汉康陵陵台全景（南→北）

处直墓也是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墓门、甬道、墓室五部分组成,由墓门至后室全长12.5米,前室顶高4.25米,后室顶高3.4米。封土范围南北长约25~30、东西宽约25米,残高约5米^[7]。前蜀永陵王建墓和南唐李昇(高祖)与李璟(中宗)二陵^[8]级别同南汉三陵完全相同,都属十国中的地方割据政权,永陵和南唐二陵只发现有地宫和陵台,没有陵垣及角阙、献殿等地面建筑。但陵墓的规模远大于南汉帝陵。王建墓陵台现高约15米,直径约80余米,是经夯打的圆形封土丘,周围界以石条,并有砌砖。陵台正南有两土墩,相距18米。墓室为红砂岩建筑,十四道券,全长30.8米,内长23.4米,分前、中、后三室,每室之间以木门相隔,高度分别为5.45米、6.4米、5.5米^[9]。

三

正是因为康陵陵园规模小,所以也就因陋就简对陵园建制作了一些简化。例如虽然也号称帝陵,四周垣墙只在南墙开有陵门,垣墙内没有献殿设施,陵前神道石刻少甚或没有,也不见有外陵园的建筑痕迹。作为一个地处岭南的小王朝的帝陵,刘岩的康陵陵寝制度上又很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即时代的因素,又反映地域的特色,还可能与墓主人自身的个性与价值取向有关。

首先看玄宫,分前、中、后三室,与前蜀和南唐二陵相似,但多壁龛是南汉帝陵的特点(图六),这是延续了中原地区唐墓形制的变化规律,五代的冯晖墓和王处直墓也多壁龛。前室立置哀册文碑的作法很少见,考察目前所知的唐宋皇陵和陪葬墓以及五代时期的同级别墓葬,都不见有“一碑当穴门而立”的现象。墓室内放置墓志是唐及五代墓葬比较常见的作法,如冯晖墓“周朔方军节度使中书令王故冯公墓志铭”等,此外玉质的哀册和谥册也是唐及五代陵墓必备的随葬品,但这两类物品在康陵玄宫均未发现。虽然康陵多次被盗,但墓志和玉册的残片一件也未发现,尤



图五 康陵陵台与地宫平、剖面

其是玉册,全部盗走的可能性不大。康陵被盗时间比较早,近一两百年估计是再没有人进去过,一般石质的墓志被人盗走的可能性也不会有,特别是宋明阶段。在关于康陵的文献记载中也没有对此类物品的记述。在唐及五代其它墓葬中发现的墓志和玉册也都是劫后余存的物件,不可能康陵就被洗劫的一干二净。所以,康陵玄宫本身就没有墓志和玉册,而是设置哀册文碑代替了。

接下来看陵台的形制,方座漫园顶的包砖圆丘的封土形式甚为特殊。唐陵除“因山为陵”之外,多沿用汉代陵墓以方形为贵的制度,在平地上起建正方形的上小下大覆斗形陵台,都是积土为陵,体积甚大,未见有包砖者。这种以“多层台阶式方形陵台为贵的制度,后来为北宋的陵墓所沿用。北宋皇帝的陵台是正方形而三层台阶式的,皇后的陵台是正方形而两层台阶式的”^[10]。北宋皇陵中的永定陵上宫陵台作三层台阶状,下部两层在夯土表面包砖,砖外粉以红灰,顶部夯土呈覆斗状,直接在夯土表面粉刷红灰。陵台底部四周有宽1.2~1.3米的散水,其外侧用两条砖立砌作边,内为条砖横向平铺,南部散水与东部散水相交处,砌有一排条砖呈放射状,并贯于内、外两角^[11]。永定陵陵台夯土表面包砖和周围置散水的作法与康陵相似,只是康陵是包砖到顶,陵台式样是底部为方形基座,坟丘为砖包土的圆顶覆钵状。陵台表面都刷灰,只是前者刷红灰,后者刷白灰。

王建墓陵台圆形封土丘周围界以九层石条,每层向上内收约10厘米,石条上原有砌砖五层。石条外约2.5米有砖基一道,宽约1.8米;其外

1.5米处又有砖基一道,宽约0.65米;距此砖基之外1.5米处又立砌砖基一道,宽仅两层砖厚,约10厘米^[12]。王建墓圆形封土丘外砌石条和砖近似与康陵砖包夯土圜丘,而陵台周边的三道砖基可能起到散水的作用,原地面估计会铺有砖,正南的两墩和其间的砌砖则估计与踏道或门阙有关,发掘者也认为永陵陵台外的砖基建筑遗迹或与陵垣的建筑有关。

五代正是唐宋之间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分裂割据,多种文化因素融合变异,这种陵台表面包砖和涂灰的作法是不是从五代继承而来?

环封土周壁下部砌石或砖在五代比较常见,王审知夫妇墓墓冢为长方形,上为封土,下垫条石,环砌青砖,内填碎石杂土^[13];后蜀孙汉韶墓封土略呈覆斗形,夯筑,边缘有砖砌成的加固墙^[14];前蜀王建墓也是封土丘围砌石条和砖。封土下部用石条或青砖围砌,更多的考虑可能还是为了加固封土,以免遭受雨水冲刷的破坏,五代时期这种作法多见于南方地区,到了北宋,永定陵上宫陵台下部也在表面包砖,应是沿袭了五代的作法。

唐代帝陵有在夯筑垣墙上抹白灰墙皮,然后涂朱的现象^[15],但封土未见有粉饰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唐陵或“因山为陵”,或“堆土为陵”,规模宏大,视觉上取其壮观则已。发展到五代至北宋,不但垣墙(神墙)表面涂灰,而且陵台表面也作粉饰,如永定陵上宫和康陵。这是因为其封土为堆筑或夯筑,体积小,规模不大,即便于操作,也求视觉上美观。

封土丘夯筑、外包砖到顶(或接近顶部)、朝向墓道正中位置还辟有神龛,这种形制目前仅见于康陵,固然可以将其解释为因为康陵封土规模小,便于整体包砖围砌,更好地保护封土。但方形基座覆钵状或馒头状的包砖封土丘始终让人



图六 康陵玄宫内景(北→南)

觉得另类,很自然地会同印度佛教建筑中的窣堵波联系起来。印度窣堵波的本意系指坟墓,其主体是半球状的覆钵,即塔身,梵文称 anda,其下部有供右绕礼拜用的附阶,再下部为基坛。在覆钵之上有方形的平头(神祇),上立刹杆,杆上装伞盖。在其周围一定距离处建有栏楯,栏楯四方辟四垣门^[16]。这样一座窣堵波是寺院中最神圣的场所,也是佛陀生涯中最后的大事件涅槃的象征,用于顶礼膜拜的,后被视为宇宙图式的象征来理解。随着佛教传播,窣堵波这种建筑形式,又逐渐传入中亚、中国、朝鲜、日本、南亚、东南亚诸国,并与当地建筑相融合,其形式也异彩纷呈。

康陵陵台顶部已毁,原貌不详,根据包砖壁的走势推测当为漫圆顶或近平顶,不知还会不会立有刹杆或伞盖等构件?南壁正中辟有神龛,前面有祭台,估计龛内摆放祭奠或供奉的物件,该区域还设置附有顶盖的墓上建筑。这类形式在唐宋陵制均不见,实属特殊,非以平常心所能理解。南汉偏居华南一隅,首都兴王府又设在中西文化交流甚为发达的广州,文献载刘岩好佛事,在位期间在广州城兴建了大量佛教寺院,“南汉‘崇重西教’,把供养僧鹭、增修佛刹作为取得瑞感的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南汉时期广东修建寺院45所,其中兴王府最多,著名的‘东七寺’、‘西七寺’、‘南七寺’、‘北七寺’就是这时修建。”^[17]刘岩崩于大有十五年(942年)四月,光天元年(942年)九月迁葬于康陵,按照唐代营建寿陵的制度,康陵应该在刘岩生前就开始营建了,其陵园制度和陵台形式应当经由刘岩本人钦定过的。陵台的这种特殊形式是否体现了刘岩本人的意图?

“龔在位,专以惨毒为事,所诛杀粤人,若刈菅草,死后数百年,粤人始得而甘心之,所谓天道好远非耶。尉佗有功德于民,死葬禺山。人不忍言其故处。仁与不仁之报,盖若是哉”^[18]。刘岩性格残暴,不似在儒家仁义道德传统礼教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土之人,后人对其有“非我族类”的疑惑。

陈寅恪先生曾提到:“近年桑原隲教授《蒲寿庚事迹考》及藤田丰八教授《南汉刘氏祖先考》(见《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皆引朱《萍洲可谈·貳》所载“北宋元祐间蕃坊刘姓人娶宗室女事”,以证伊斯兰教徒多姓刘者,其说诚是”^[19]。似乎对藤田丰八教授南汉刘氏祖

先为胡人的说法也不表示反对。

所以,以上有关论述涉及到刘岩崇信佛事、有胡人血统等,或许也是导致康陵陵园布局,尤其是陵台结构与众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陵园垣墙四隅建角阙(或曰角楼)的制度由来已久,西汉杜陵王皇后陵陵园西北角就发现有曲尺形角楼基址^[20],估计其他西汉帝陵也会有,这应该是仿汉长安城的形式修建的。汉长安城宫城四隅筑有角楼,1988~1989年发掘的未央宫宫城西南角楼遗址,基址平面呈曲尺形东西67.4米、南北32.5米,角楼北壁西部有斜坡漫道,遗址内出土有剑、矛、弩机、镞、弹丸等兵器,还有不少铠甲片、胄片等,应是守卫角楼士兵使用的。遗址还出土图案、图像和文字等瓦当,说明有屋顶建筑^[21]。唐代陵园未经正式发掘过,经调查可知乾陵有内外两重的墙垣,内垣方形,四隅有观阙,文献中有“观阙高三丈七尺”的记载;北宋皇陵经调查和试掘可知角阙均呈曲尺状拐角,曲尺两边均作长方形。经试掘的永定陵上宫东南角阙有包砖和包砖基槽,表砖用整砖,并用白灰粘缝,向上逐层内收,每层内收0.7-1.2厘米;里砖为半截砖,用泥作缝^[22]。其建筑工艺与康陵角阙相似。

汉唐帝陵与北宋皇陵的角阙基址平面无一例外都作曲尺状,由于其陵园规模比较大,作为警卫用途的建于墙垣四角的角阙相对就比较高大,如乾陵“观阙高三丈七尺”,阙台之上应是士兵可以登临守卫了望的阙楼。而康陵角阙基址平面是内大外小两个正方形阙台散水对角相接,一组双角阙,上有庑殿顶,但是否是“观阙”,人可以登上去作警卫,就很难说了。康陵阙台的规模本身就不大,阙顶自然就不会很高,很难再有足够的空间修筑登临的阙楼了;四隅角阙的废弃堆积中未发现任何生活用品,更不用说守卫士兵遗留下的兵器了;更难理解的是,作为警卫用途的角阙,何以不有效利用四隅垣墙拐角位置建成常规的曲尺形,而是别出心裁地建成散水对角相接的双角阙,且大角阙在垣墙之外?如果作为可以登临警卫的“观阙”就不太合理了。所以康陵角阙不具的真正登临守卫的作用。

一直以来,南汉遗存在广州的考古发现当中比较零星且不完整,关于南汉国遗迹的研究远没有南越国遗迹的研究开展得顺利,相信以南汉德

陵和康陵的发现为契机,可以有力地推动关于南汉国城市考古和南汉史的更深层次的研究,也为考证五代十国期间的帝王陵寝制度提供宝贵的物证材料。

注释:

[1]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汉德陵、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7期。

[2]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245页“表六唐代皇帝陵园、封土规格一览表”,科学出版社2005年。

[4]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59~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第二章·北宋皇陵的勘察》,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6]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年。

[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8]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年。

[9][12]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叁 陵台的外形及建筑》,文物出版社2002年。

[10]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第三章·永定陵上宫的试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13]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5期。

[14]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五代后蜀孙汉韶墓》,《文物》1991年第5期。

[15] 沈睿文:《唐陵陵园布局的分类及演变》,《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6] 孙机:《中国圣火·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7] 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第1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8]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刘鋹墓》第496页,中华书局1985年。

[1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第365页,三联出版社2001年。

[20] 刘庆柱:《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图三王皇后陵陵园与寝园平面图,《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年。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2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第三章·永定陵上宫的试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